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專刊(11)

梁啟超與清季革命

張朋園著

中
央
研
究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專
刊
(11)

梁啟超與清季革命

張朋園著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六月再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六月三版

中央史研究所專刊(1)

梁啓超與清季革命

定價 精裝本新臺幣九〇元 美金二·五元
平裝本新臺幣七五元 美金一·二元

國外定購另收郵費
精裝美金三角
平裝美金一角

版 所 有 權
印 必 究

著者 張朋園
編印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地址：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
承印者 永裕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

蕭公權先生序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中一個聲名洋溢的人物。他的言論對於近代的中國發生過廣大的影響，甚至五四運動的領袖幾乎沒有一個不曾因讀了他的文字而得著啓示。然而從民國十八年他逝世到現在三十多年當中，雖有一些論述他的文字，却都比較簡略。國外雖有人寫了一部專論他與中國近代思想關係的書（註），但可惜作者不能體會任公立言的意旨和精神，雖然旁徵博引，大放厥詞，却不免有捕風捉影、弄巧成拙之感。現在張朋園先生的梁啟超與清季革命（一部二十餘萬言的書）才第一次把任公一八九四到一九一年間有關政治言論的背景、動機及影響作有系統的敘述和分析。這是近代中國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貢獻。讀者不必同意於書中一切的論斷，但他不能不承認這是一部精心結構的著作。

張先生根據可靠的史料（最主要的是千餘萬言的飲冰室合集及丁文江編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說明：（一）任公雖曾受康南海的影響，但他的思想並不為南海所範圍；（二）在清亡以前任公雖致力於君憲運動，他不能忘情於民權革命；（三）他與革命運動雖暫合而終離，但他的

言論直接或間接有助於革命思想的發展；④他在新民叢報中攻駁民報的文字有助於革命主張之更趨於明晰與縝密；⑤他與辛亥革命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因他對革命不乏助成的影響，也可以說是一個「革命先覺者」。在這些論斷當中頗有未經人道的創見。

張先生對於任公與革命運動暫合終離的事實提出了解釋。張先生著眼於任公多年所服膺的民權思想，他當時所處的環境，他個人的感情，以及他與康南海的師生關係。從前由於民權思想及政治現狀之影響而暫合，後來因感情左右而終離。在大體上這是不錯的。但細繹飲水室遺著，我們可以看出任公的民權思想與民報所揭橥的民權主義有不盡相同之處。任公的思想似乎比較接近英國傳統的自由主義。他主張辨別是非，却不相信真理絕對，因此他也不堅持個人一時一地的見解必然是正確而不可移易的。他毫不諱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在清末民初時代的言論家當中他是最富有「民主態度」的一個人。他反對「民之父母」的政治觀。民權的目的是經過「開民智」，「新民德」的程序使個人得到最高的人格發展。一個政府管理人民的生活，無微不至，縱然使得人人豐衣足食，但因為它阻礙了個人自動自發的能力，也不能算是真正良好的政府。革命論者也講民權。但他們的思想淵源，與其說是英

國的洛克 (John Locke) 或穆勒 (J. S. Mill)，無寧說是法國革命先覺的盧梭 (J. J. Rousseau)。他們理想中的政治不以限制政府權力以發展個人能力為目的，而以檢束個人自由以伸張國家自由為宗旨。他們的民權觀念，因此與任公的民權觀念大有分別。這不是說任公的民權觀念優於革命家的民權觀念。自由主義的民權政治只能在憲政已成的國家裏面出現。任公的「民主態度」在中國清季民初的現狀之下是不合時宜的。一般人不但不贊美他虛懷若谷，反而譏笑他反覆無常。如果上述的觀察尚無大誤，那麼任公之與革命運動終歸分離似乎還有思想上的因素。任公自述其癸卯思想轉變的經過說這是不但由於康南海屢加「責備」與「婉勸」，他自己也「不慊於當時革命家之所為」。這話是值得注意的。入民國後任公效忠於共和政府，投身於政黨政治，傾覆袁世凱的洪憲帝制，反對康南海的宣統復辟，但到底不與中華革命黨或中國國民黨合流。這雖然由於人事的關係，但不能說全無思想態度上的影響。

張先生這部書的目的是「說明任公在清末十八年間的行誼，由求變的思想以至於與革命運動的合離，並在合離的經過中檢討其對於清季革命的影響及其得失。」毫無疑問，張先生已經十足的達成了這個目的。筆者要建議於張先生：希望他續寫一部「梁啟超與民國政治」，

把任公壬子年以後的行誼作同樣系統的精密的檢討。這一建議必然可以得到本書讀者的贊同，更盼望能得到張先生的允諾。

誌·Joseph R.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蕭公權 五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自序

本書敘述梁任公早期的思想及政治運動，從他二十二歲開始關心國事起，到三十九歲辛亥革命為止。全文有七章：第一為任公的求變思想，第二為在國內時期的倡導民權及族類言論，第三為流亡日本後的排滿論及建立民國的主張，第四為任公與孫中山先生的合離關係及其在庚子自立軍之役中的奔走策劃，第五為思想轉趨溫和的由來與主張立憲的影響，第六為與革命黨的論戰，第七為任公言論的總述，以統計數字看他的言論影響。此外加上我自己的一點認識與感想，合計共得九章。

我的研究計劃原是「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由於梁任公在辛亥之前四五年間為立憲派領導者之一，便以他為入手研究的對象。在閱讀材料時，發現任公主張立憲之前，思想一再轉變，頗有可述的地方，尤其其他的啓蒙言論，比之立憲主張更有影響，所以我的探索就往前推進了一步。在進一步閱讀中，又發現任公在思想上曾經一度激進，在行動上更想有一番變革的作為。從他辦時務報開始，中經執教時務學堂而至戊戌維新，他的求變思想，由孕育而成

熟，欲求付諸行動。戊戌政變避居日本後，一面繼續言論鼓吹，一面與孫中山先生攜手，節演變，非常引人入勝。

任公的思想與行動，雖然後來轉趨溫和，但是他與孫中山先生分合的一段史事，最是動人。我常常假設：如果他們的合作有成，救國的大業或不致因為力量分散而困難重重，辛亥武昌起義說不定要提早幾年，民國初年的歷史也許隨之改觀。

無論如何，這段可歌可泣的史事是值得敘述的。任公的啓蒙運動與激進思想有它的價值所在。他轉趨溫和之後的思想亦有其影響。由於這幾方面的探索，材料不斷增加，竟然成了本書，原來的研究計劃只好留待他日了。

我所引用的材料，最主要的是任公在報紙雜誌上發表的初刊著作。（這些著作大多收羅在飲冰室文集中，雖然有小部份沒有收進去，或收進去了而與初刊小有出入。）丁文江先生所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對我有很大的幫助。另外我又引用了許多與任公同時人的作品，以充實我的內容。

任公在辛亥之前所辦的七種報刊雜誌，得見者六種，給了我很大的方便。各刊均有其不

同的份量和地位，我在借重之餘，又一一加以分析，用統計數字來表示其影響力。

本書在閱讀材料及撰寫過程中，承蒙郭量宇師多方指導，啓發鼓勵，得益最多。文成之後，又承胡秋原先生賜予核閱，給予幾點指示。史坦佛大學教授劉子健先生曾經鼓勵我對任公所受進化論的影響多予發揮。謹此併致崇高的敬意與感謝。

我尤當感謝蕭公權先生。本書初稿排成後，才有機會送請蕭先生賜閱。承其在百忙中來函詳加指正，並惠賜序文，使本書增光不少。

再又王聿均先生、王樹槐先生、張存武先生、魏廷朝先生都曾提供我許多寶貴的意見。李毓澍先生、呂實強先生遠在海外，分別代為找到一些手邊沒有的材料。我的同學黃養志先生曾為本書精校一通，改正若干錯誤。謹併誌銘謝。

因為作者學識譖陋，且忽忽在年餘中完成本書，難免有遺漏舛誤之處，尚望先進學者不吝賜教。

張朋園序於臺灣南港

民國五十三年四月五日

本書印行以來，謬承學界獎許，舊罄已久。茲將原書再版影印，除改正印刷上之錯誤外，內容及參攷書目略有刪訂，附增引得一節。惟因影印不容多所更動，且整體之修正費時，故大體亦仍其舊。

張朋園 民國五十八年二月

梁啟超與清季革命 目錄

梁啟超像

蕭公權先生序

自序

一、緒論

二、求變思想的基礎——梁啟超接受中西文化的過程

一一

①在中國文化中求變——三世之義

一一

②在西洋文化中求變——民權、自由、進化

一八

三、啓蒙思想與鼓吹革命——梁啟超戊戌之前的激進言論與志氣

四七

①明倡民權

四七

②隱言族類

六六

四、新民、破壞、革命——梁啟超流亡日本前期的革命言論

八一

○排滿以興民權	八一
○破壞以建民國	一〇四
五、坐而言起而行——梁啟超與革命黨的合離始末	一三九
○孫梁始合而終離	一一九
○自籌革命起義	一三九
六、異曲與同工——梁啟超流亡日本後期的言行	一六三
○言論轉變的由來	一六三
○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實	一七七
七、他山之石——梁啟超與革命黨論戰的影響	二〇七
○論戰述要	二〇七
○開明專制與約法訓政	二三二
○土地國有與國計民生	二四二
八、言論界的驕子——自報章發售數字看梁啟超言論的影響	二五三

①中外公報	一一五四
②時務報	一一五七
③清議報	一一七三
④新民叢報	一一八六
⑤新小說	一一〇四
⑥政論	一一一
⑦國風報	一一一
九、結論	一一三
梁啓超大事年表(清季)	

參考書目

引得

梁啟超與清季革命

一、緒論

梁任公（名啟超、字卓如）的一生，跨清民兩代，自二十二歲時（甲午年）開始關心國事，一生事功，在清朝者十八年，在民國者十八年，恰好各得其半。

梁任公的一生是多方面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擇取任何一點，都可以彙辭數萬，編著成書。但簡單歸納起來，可以說他是一個新聞記者，是一個教育家，是一個思想家，是一個文學家，是一個史學家，是一個藝術鑑賞家……。談到他的政治生命，說他是立憲運動者，因為一般論任公者所公認；然而未嘗不可以說他是個革命運動者；因為他實與革命有過一段因緣。至於他在思想界的影響，任公的著述，估計不下千數百萬言，對近六十年來的中國，無論政治、經濟、財政、社會、學術，其深遠處，幾無出其右者。如捨了任公不談，都將殘缺不整。他的一生真是多彩多姿的。

多彩多姿的梁任公，一生言行所以能有多方面的影響，就當時的環境及他個人而言，有幾種必然的因素。當時的世界潮流，西方自有孟德斯鳩的「法意」，盧梭的「民約論」以來，一二百年的演變，民權政治的思想，已傳播到了世界的每一角落。受進化論影響，與民權政治同時而起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也發展到了頂點。中國受這三種思想撞擊最利害的，是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所以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對外關係，直是一本慘痛的歷史。中國到了求變的時代，就等待求變的人物來推動而已。任公便是求變的人物，他生當其時，這是注定他將發生影響的外在原因。

就任公本身而言，他具有發生影響的條件：第一，他生而好學。他曾說：「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旁皇中。」任公自幼聰慧，因而能脫穎而出，十二歲中秀才，十七歲中舉人。在科第時代，一個普通人中舉之後，往往趾高氣揚，容易心滿意足。任公與衆不同。中舉的次年，竟反過來拜尚是秀才身份的康有為為師，又從基本做起。四年萬木草堂的生活，孜孜不倦，奠定了他博大精深的國學基礎。但他並不就此而止。西學之風襲來，他又乘風而去。先讀繙譯作品，不能滿足，再從文字工夫下手。他讀過英文，拉丁文。可

惜他學習西洋語文的天份不高，後來雖又涉獵法文，德文，皆無大成。然而日本文給了他最大的方便，西洋知識通過日文而飽為吸收。任公的西學大進，實得力於日文。以後他的求知慾未嘗稍止。四七之年，蟄伏巴黎，以學生為老師，知識仍與時俱進。直至垂暮之年，讀書仍為嗜好，且趣味愈擴愈廣。他曾對子女們說：「我是學問趣味極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專精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內容異常豐富，能夠永久保持不厭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歷若干時候，趣味轉個新方向，便覺得換個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覺這種生活是極其可愛的，極有價值的。」任公的成就及影響，的確倚靠他好學不厭精神的支持。一般人以為任公之學，博而不深。後人看前人，自然很容易發現他的缺點，但與他同時代者，又有幾人能超過他？

人或者都能飽學，但未必都能運用其所學，以啓迪社會，激發後人。任公則二者兼而有之，既好學不厭，且誨人不倦。他一生的言論著述，據最保守的估計，不下於一千四百萬字，每天執筆，平均在三千言以上。他的著作特色，如其自評：「筆端常帶感情，別有一種魔力。」他能「言人口中之所不能言，心中之所欲言。」今日讀之，腦筋隨之而去，明日再讀